

中共領導人物的「五四」經驗

周玉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五四運動爆發時，世間尚無中共，自無中共黨員可言。日後的中共人物裡，則不乏曾經涉足五四運動者，尤以「南陳北李」—陳獨秀與李大釗為最著，而為大陸史書所樂道，彼等在五四運動前後的言行真貌，亟待還原與解析。後來崛起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五四運動時的思維與角色，亦有檢討以明真相的必要。

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鼓吹民主與科學，加上革新政治的工具—新文學，三者構成新青年以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陳獨秀念茲在茲，拳拳服膺，馬克思主義此時在他的思維中，近乎一片空白。

李大釗被視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其實，他雖然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但始終強調互助論，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倫理觀—要待完成階級鬥爭後，人類真正理想王國才會來臨的理論，深表懷疑，認為應予修正。

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政治參與，扮演了一種響應者的角色，其聲音與力量多集中在湖南一省，影響力就全中國而言自屬有限，內容也多與馬克思主義無關。此時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超過了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本著救國的純潔動機，參加了五四運動，也演出一個地區性的角色。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把馬克思主義摻雜在這項愛國運動裡。此時他的理念，完全反映了五四運動的內容—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

廣義的五四運動即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中，有些人粗具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知識，但在那個各種理論雜陳的時期，往往有人身兼數種政治信仰，甚至在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同時否定其核心主張—階級鬥爭，因此不能遽稱他們當時就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尤不宜認為，反對民族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

關鍵詞：民族主義、現代化、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五四運動

* * *

一、前　　言

五四運動至今已八十年，其間景慕者有之，詬病者有之，釋義者有之，曲解者亦有之。

五四運動一如辛亥革命，打破了黑格爾的預言。十九世紀初，黑格爾形容中國歷史發展正處於「永恆的休止」，將不會有任何的轉變。結果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危急存亡之秋，紛紛採取行動，從器物改良到思想革命，寫成一部死裏求生的近代現代史。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政體，開中國前所未有之新局，從此確立主權在民的原則，為全民政治的理想奠定了基礎。

辛亥革命產生了中華民國，而中共是中華民國的否定者，因此貶抑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轉借五四運動以自壯。衆所周知，五四運動本身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如果沒有爭取山東權益的問題，則俄國的十月革命根本不足以使中國發生此事。列寧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所以第三國際在製造中共時，不忘推廣馬克思主義。誠然，廣義的五四運動即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中，有些人粗具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知識，但在那個各種理論雜陳的時期，往往有人身兼數種政治信仰，甚至在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同時否定其核心主張——階級鬥爭，因此不能遽稱他們當時就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尤不宜說，反對民族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由北京出發，以民族主義為要義，新文化運動則表現了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其後的五卅運動由上海出發，顯見社會主義的成分。前者抗日，後者反英，俱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共產主義來自蘇俄，因上海的五卅運動而擴大，非因北京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天遭軍警逮捕的許德衍，後來重複毛澤東的聲音，謂五四運動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①。如此抹煞自己昔日的愛國情操，傍人門戶，恐非有識之士所能首肯。

在三篇不同的講詞中，毛澤東首謂「五四運動之成為文化革命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一種表現形式。」^②此說雖不脫共產黨慣用的語氣，但至少承認五四運動的非共性質。及至準備向蘇俄靠攏，他即改口強調「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③如此輕易將五四的功勞拱手讓給俄國人，並且生搬硬套階級鬥爭的公式。最後為了整肅今昔

註① 許德珩，「孫中山先生對五四學生運動的同情和支持」，原載「九三社訊」，題為「紀念與回憶」，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版，頁六三八。

註② 毛澤東，「五四運動」（一九三九年五月），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五二年八月重排本，一九六五年六月第十二次印刷），頁五四五。

註③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〇年一月），收入同前引書，頁六九三。

的異己，他又表示「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④凡此三變，顯示對五四評價的矛盾和混亂。

誠然，五四運動前兩年出現了俄國革命，後兩年出現了中共，三者在時間上如此接近。但是，中共主要屬於蘇俄東方政策下的產物，若無五四運動，它仍可能出生。我們也不必諱言，五四人物高唱民主與科學，以學習西方為救國的手段，但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露出了帝國主義的面貌，依舊是強權戰勝了公理，使得中國人大失所望，部分知識分子於是轉向蘇俄，改走俄國人的路，終以悲劇收場。然而，毛澤東倒果為因，說俄國人號召了五四運動，不免自陷於歷史的盲點。梁啟超嘗謂，歷史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換言之，歷史不免價值判斷，但須根據史實。筆者本此精神，以「不哭不笑，但求理解」為前提，還原中共人物與五四運動的關係，盼收鑑往知來之效。

五四運動爆發時，世間尚無中共，自無中共黨員可言。日後的中共人物裏，則不乏曾經涉足五四運動者，尤以「南陳北李」——陳獨秀與李大釗為最著，而為大陸史書所樂道，彼等在五四運動前後的言行真貌，亟待還原與解析。此外，後來崛起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五四運動時的思維與角色，亦有檢討以明真相的必要。

二、陳獨秀的「五四」經驗

一九一五年春，陳獨秀自日本返國，九月創辦青年雜誌，以社會啓蒙者自許。他在創刊號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對法式民主推崇備至，嚮往之情溢於言表。論及社會主義，也以聖西門與傅利葉為主，並稱道勞資協調的社會政策，他主張的社會主義屬於溫和派，至為明顯。次年九月，該誌改名新青年，仍延續已發行的卷數稱第二卷，他以梁啟超「新民說」式的筆觸，勉勵青年積健為雄，滌盡做官發財的思想，而拔本塞源之計，在提昇民族的公德與私德，否則雖有少數難能可貴的愛國烈士，非徒無救於中國之亡，行見種族之滅。他的愛國主義，不在為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為國家惜名譽、弭亂源、增實力，故提倡勤儉廉潔誠信六德，以為持續治本的真正愛國行為^⑤。此說無異於孫中山先生倡言的「有道德始有國家」，亦即以道德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動力，可視為一種新倫理觀，無疑偏向唯心主義。

新青年此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陳獨秀遂於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謂該雜誌同仁本來無罪，罪在擁護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

^{註④}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一九五三年五月重排本，一九六四年九月第十一次印刷），頁八三三。

^{註⑤} 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收入獨秀文存上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版），頁九四。

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⑥該文堅持民主與科學，加上革新政治的工具——新文學，三者構成新青年以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陳獨秀是激越的鼓吹者，念茲在茲，拳拳服膺，馬克思主義此時在他的思感中，近乎一片空白。五四運動前夕，他最關心巴黎和會的消息，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更指名笑罵，不留餘地，顯示其個性的剛烈，也充分預告了五四運動的愛國本義。

陳獨秀並未參加五四當天的示威，但他密切注視此事。及至六月三日，愛國行動達到高潮，衆多學生被捕，他憤而走上街頭，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果被軍警逮捕，立即震驚全國。同年九月，他在八十三天的牢獄之災後獲釋，繼續從事研究，主張以英美為榜樣，實行民治主義^⑦。十二月，他發表「新青年宣言」，再度闡述民主與科學，認為眞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給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以有無職業為準，不以有無財產為準。「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⑧他同時相信，尊重自然科學與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當時社會進化的必須條件。這篇宣言是理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體，並顯示杜威思想贏得了中國新文化領袖的好感，馬克思主義在此並不醒目，實驗主義凌駕辯證唯物論之上，階級鬥爭的觀念也被明確拒絕^⑨。不僅思想界的領袖如此，五四事件前後的中國知識青年大多具此傾向，非以共產主義為信念。五四運動欲實現的民族國家，原為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固有體制，此時的鼓吹者如陳獨秀，則以大革命後的法國為榜樣，自由、平等、博愛也成為民主的代名詞。民主與科學相提並論，即為法國啓蒙運動中國版的兩大內容。

至一九一九年底為止，陳獨秀的思想主流是民主主義，此為中共的史家所不諱言^⑩。換言之，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後的重要理念，皆與共產主義無關。一九二〇年初，他從北京遷居上海。五月間，第三國際代表胡定斯基抵滬，與之商談組黨事，此時他在理論上已成為共產主義者，發表了「勞動者底覺悟」等文，宣傳勞動創造世界說。因此，論者以一九二〇年為陳獨秀進入共產運動的時期^⑪。其實，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若干觀點，並未全盤接受。例如遲至一九二一年八月，他仍然認為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偉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之中，便失去理性。同時，有史以來成功的革命，無一不是少數人壓服多數人，俄國十月革命也

註⑥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收入同前引書，頁三六三。

註⑦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收入獨秀文存上冊，同註⑥，頁三八〇。

註⑧ 陳獨秀，「新青年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收入同前引書，頁三六七。

註⑨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76.

註⑩ 胡華、彭明，「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收入胡華主編，五四時期的歷史人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版），頁一〇七。

註⑪ 鄭玉汝，陳獨秀年譜（香港：龍門書店，一九七四年九月，初版），頁三一。

不例外，而中國如有一億人獻身社會革命運動，即為一億人壓服三億人之舉^⑫。此說無異否定群衆的意志，自與馬克思主義不符。他還強調此時中國的勞工運動，「一不是跟著外國的新思潮湊熱鬧，二不是高談什麼社會主義，不過希望有一種運動，好喚起我們對於人類的同情心和對於同胞的感情，大家好來幫助貧苦的勞動者，使他們不至於受我們所不能受的苦惱。」^⑬此種人性論與改良主義的思想，又與階級革命論格格不入，所以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時，態度並不徹底，為中共的史家所承認^⑭。五四運動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無涉，此處可為明證。

陳獨秀晚年深思熟慮，回歸自己在五四時期的立場，擁護民主與科學，而析論更見精闢。他直指科學、民主制和社會主義，乃近代人類社會的三大天才發明，至可寶貴。不幸俄國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將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和「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空洞名詞，一種控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⑮。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如下：法院以外的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以及思想宗教自由等，這正是蘇聯等國所要推翻的^⑯。證諸八十年代，中共猶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亦即反對陳獨秀列舉的各項自由，則其見解可謂歷久彌新。

三、李大釗的「五四」經驗

一九一六年四、五月間，李大釗放棄早稻田大學的課業返滬，六月北上籌編晨鐘報，八月該報誕生，他撰文介紹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似可說明此時和魯迅一樣，崇尚「托尼思想」。九月新青年刊出他在日本寫的「青春」，仍以唯心主義為主導。一九一七年一月，章士釗創辦甲寅週刊，李大釗應約擔任編輯，發表時論多篇，不乏批判守舊派迷信孔子之作。直到該年八月，他才表示不敢對梁啟超的改良派寄以奢望，但仍建議彼等堅持政治信念，與革命派行軌道內的對抗，不為軌道外的芟鋤，主義不妨與急進者稍事融通，權力不妨對固陋者稍事退讓，改良派對新舊離合的變遷減免一度，即政治上的紛擾潛消一度，「庶所謂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者，或有幾分之成功也。」^⑰此說顯然是一種調和論，去暴力鬥爭說甚遠。中共現亦承認，

註⑫ 區聲白、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原載新青年第九卷第四號，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引自彭明，「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收入王樹棣、強重華、楊淑娟、李學文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上冊（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頁一五五。

註⑬ 陳獨秀，「此時中國勞動運動的意思」，原載勞動界第四冊，一九二〇年九月。引自彭明，「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同前引書，頁一五六。

註⑭ 彭明，「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收入同前引書，頁一五六。

註⑮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一九四〇年九月），收入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香港：自由中國出版社，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再版），頁二一。

註⑯ 陳獨秀，「給連根的信」（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同前引書，頁二六。

註⑰ 李大釗，「闡偽調和」（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收入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頁五一二。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大釗同志還不可能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分析資產階級改良派與革命派的階級實質。」^⑩這無異說明，李大釗此時仍以愛國思想為其中心信仰，階級思想於他何有哉？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敏於時事的李大釗，遲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才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開始陳述他想像中的「美麗新世界」：「法人當日，固有法蘭西愛國的精神，足以維持其全國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嘗無俄羅斯人道的精神，內足以喚起其全國之自覺，外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倘無是者，則赤旗飄飄舉國一致之革命不起。」^⑪他將法俄革命相提並論，略去法國革命後造成的民權障礙，也不顧兩者本質上的絕大差異，一併讚頌不已，似可說明他此時並非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協約國擊敗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同月末，李大釗在中央公園演說，宣稱此戰在政治上是專制主義失敗，民主主義勝利，也就是庶民的勝利。民主主義和勞工主義何以致勝？因為大家要抵抗強暴勢力的橫行，乃本著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方得克敵。既已獲勝，則「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⑫這種全民皆工的觀念，接近禮記禮運篇所說的「男有分」，與馬克思定義下的無產階級——生產工具非歸己有的城市工人不同。

接著他又撰寫「Bolshevism 的勝利」，再度指稱戰局終結的真因，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和平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⑬此文將人道、自由、民主和布爾什維主義、赤旗之間劃上等號，顯示他並不了解俄共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即在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起，「自由」等詞也多已消失，依劉賓雁的記憶，只有攻擊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時，才能碰到此類名詞。

一九一八年被視為李大釗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⑭，理論上從一九一九年，他就應該是一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了。該年元旦，他撰文期待從今以後，生產制度產生巨變，全世界的勞工階級聯合起來，打倒全世界的資本階級。與此同時，他卻強調生物的進化不是靠競爭，而是靠互助。「人類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著強力互相殘殺。」^⑮如此矛盾的言論出於同爐，映現他的思想紛然雜陳，信仰不止一端。稍早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與陳獨秀共創每周評論，

註⑩ 「李大釗傳」編寫組，李大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版，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二次印刷），頁三二。

註⑪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收入李大釗文集（上），頁五七五。

註⑫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收入同前引書，頁五九五。

註⑬ 李大釗，「Bolshevism 的勝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收入同前引書，頁六〇三。

註⑭ 高一涵，「回憶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同志」，收入回憶李大釗（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頁一六五。

註⑮ 李大釗，「新紀元」（一九一九年元旦），收入李大釗文集（上），頁六〇六。

至五四運動高潮時，他在該刊發表了五十五篇文字，其中不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仍未定於一尊，愛國的筆觸也在在可視。

五四運動當天，李大釗雖然身在北京，但也未參加學生的示威遊行。陳獨秀被捕後，他營救之餘，態度轉趨激然。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約簽字，他預測巴黎的歡聲必能送入世人的耳鼓，可是國人應常紀念今年此日新華門總統府前的哭聲。他又質問威爾遜總統：二十七日巴黎的白宮宴會，法國總統舉觴祝賀各國代表，「我不知道那位威先生在那慶祝僞平和的席上，如何下咽，感慨如何？」²²⁰這些愛國的聲音一吐為快後，他再度強調人類應該相愛，依互助而生存進化，不可依賴戰爭。「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這是必然的事實。」此種社會互助論和心物並重論，自然有別於階級鬥爭論和唯物論，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解釋。「總結一句話：我信人類不是鬥爭著、掠奪著生活的，總應該是互助著、友愛著生活的。階級的競爭，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現了。我們可以覺悟了。」²²¹此種階級鬥爭熄滅論，與毛澤東後來高呼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正好背道而馳，此固因時空的差異，「北李」與「南毛」個性不同亦有以致之。

一九一九年九月起，李大釗在《新青年》上連載「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該文名為自己的觀點，實則主要轉譯自河上肇的日譯馬克思原著，內容包括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說和經濟論。在評論部分，他承認馬克思有些「牽強矛盾」，「近來哲學上有一種新理想主義出現，可以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蔽」。他更強調當此過渡時期，應加倍致力於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剷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所養的惡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²²²。此係李大釗成為中共創始人物的前夕，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對馬克思主義並未全面揄揚，反而多所矯正。隨著一九一九年的結束，中共的史書也寫完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之一」這章，他在五四時期的思想脈絡，也較清晰可尋了。

四、毛澤東的「五四」經驗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毛澤東和一些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最初會員為二十一人，後來發展到七十八人。中共現在認為，新民學會是湖南共產黨的前身，實質上起過秘密黨小組的作用²²³。此說如能成立，也是後期的事。倒是毛澤東自己承認，新民學會和當時中國許多團體一樣，是受了《新青年》影響才組成的，他在校時熱烈嗜讀該雜誌，特別喜歡其中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自稱後二者代替了康梁，成為他崇拜的人物。

註²²⁰ 李大釗，「威先生感慨如何？」（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入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頁一五。

註²²¹ 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收入同前引書，頁一九。

註²²²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月），收入同前引書，頁六八。

註²²³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北京：新華書店，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頁七〇。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於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不久，陪同預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抵達北京，自己則未出國，經北大教授——前第一師範教員楊昌濟的介紹，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助手。毛澤東後來指出：「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們都不屑和我接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瞧我不起。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像傅斯年、羅家倫之類，我對於他們特別感覺興趣。我想去和他們交換一些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意見，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土語。」²⁸毛澤東這種早年心理受挫的經驗，可能影響到那後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事實上，傅斯年與羅家倫日後都被指為「反動文人」，胡適更是飽受攻擊，陳獨秀也一度成了「托匪漢奸」。

一九一九年四月，毛澤東經上海回到長沙，在修業小學教歷史。次月，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獲得舉國響應，湖南人心亦極激昂，不久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展開抵制日貨、焚燒日貨、愛國儲金等活動，隨後湖南各界聯合會也告成立，說明了學生運動擴大為全民愛國運動的效果。以上各組織都和新民學會有關，毛澤東是推動者之一。在當時的中國，各省學運中都有像他這樣的人物²⁹。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報紙湘江評論創刊，這是一份四開四版的小型周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³⁰。主編毛澤東在創刊宣言中指出，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民主主義，至於打倒的方法則有兩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應有一番選擇。他認為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並且毫無效力，因此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此即「無血革命」，這樣才不致引起大亂，行那無效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³¹。由此可知，毛澤東此時仍主張民主改革，反對暴力鬥爭。

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連載了毛澤東所撰「民衆的大聯合」，提及大聯合的可能與必要、方法與動機、能力等，通篇為宣傳性質，其中所謂方法就是從各行業的小聯合入手，此亦無甚高論，因為已有這種事實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下的觀點：「平民已將貴族資本家的三種法子（知識、金錢、武力）窺破，並窺破他們實行這三種是用聯合的手段，又覺悟他們的人數是那麼少，我們的人數是這麼多，便大大地聯合起來。聯合以後，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拼命的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馬克思。一派較為溫和的，不

註²⁸ 愛德迦·史諾筆錄、方霖翻譯，毛澤東自傳（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頁二五。

註²⁹ 鄭學稼，「中共成立前後的毛澤東」，收入鄭著中共興亡史第四冊附錄（台北：中華雜誌社，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初版），頁一〇〇四。

註³⁰ 蕭三，前引書，頁七九。

註³¹ 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收入「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二），見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研究會編輯出版部，八一年第六期（總五十八期）（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頁三。

想急於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點互助的道德，和自願的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一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的一周，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⑫這篇算是湘江評論上最重要的文章，顯示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超過馬克思主義，互助論在他的心目中也勝過鬥爭論。

湘江評論僅出至第四期，即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被湖南督軍張敬堯所查封。連同臨時增刊一期，這份只出版五期的短命報紙，其內容與影響力根本不及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毛澤東即使再自負，日後也只能說湘江評論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⑬中共的史家卻視其為五四時代的最強音，而且還說這是在傳播馬列主義上。毛澤東後來告訴史諾，直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他再度北遊時，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且遲至一九二〇年夏天，他方能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⑭中共的史家據此，稱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是他從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發展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階段。^⑮

一個初步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應該具備那些條件？後來大陸有些文章探討及此，有人提出以下幾點：1.對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有初步的了解，2.相信共產主義，3.贊成俄國十月革命，4.主張暴力革命，5.承認無產階級專政，6.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然而，上述條件實不利於中共的改寫現代史，於是又有人從寬規定，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主要標誌是：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並用它做為指導武器，開始觀察和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此處重要的是，應以馬克思主義開始觀察和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⑯現就從寬的定義來看，毛澤東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以前，仍無法被視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至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以後，毛澤東是否就發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此亦值得商榷。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他在北京寫信給周世釗時表示：「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誌，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瞭的概念。」^⑰同年四月，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才在上海首次出版，而毛澤東即於五月初離開北京。因此，他在故都閱讀有關馬克思著作的收穫實為有限。

抑有進者，毛澤東由於不諳外文，只能透過譯本，後來他自稱讀了幾本書不久，

註⑫ 毛澤東，「民衆的大聯合（一）」，同前註，頁一〇。

註⑬ 愛德迦·史諾筆錄、方霖譯，同前引書，頁二八。

註⑭ 同前引書，頁三〇。

註⑮ 蕭效欽，「五四時期的毛澤東—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發展」，收入胡華主編，*五四時期的歷史人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版），頁六八。

註⑯ 馮建輝，「建黨初期的陳獨秀」，《歷史研究月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號，頁二九。

註⑰ 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收入「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三），見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八一年第七期（總五十九期）（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頁二十四。

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只有不明白當時中國出版界和文化界情況的人，才會相信毛澤東的話——史諾即其中之一。共產黨宣言非當時的毛澤東所能懂，就是把它由日文重譯為中文的陳望道也不了解，要等到三十年代出版梁贊諾夫（D. Rjazanov）的共產黨宣言解說後，大多數的左傾知識分子才大部分明白^⑧。值得一提者，一九二〇年夏天毛澤東返湘活動後，仍然公開鼓吹代議政治，贊成一種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綱。由此可知，毛澤東在五四時期的思想雖歷經變化，但並未盡除改良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在此期間也不是他的唯一信仰。

五、周恩來的「五四」經驗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來從南開中學畢業，同年秋天赴日本求學。抵達東京後，在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修日文，準備投考東京高等師範，該校以訓練嚴格和課程充實知名，但他因成績不佳，次年三月落榜。後移居京都，準備入京都大學政治經濟科，又未能如願。稍早他從日本寫信給南開校友陳頌言，表示不贊成過激的學生運動。他從「謹言慎行」、「安分克己」到投身五四運動，時隔不過年餘，可見其心情轉變之速。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在那危急存亡之秋，國事日非，誰能無感？周恩來溫和的外貌下，隱藏著一顆叛逆的心，加上好友馬駿在五四以後的示威中被捕，因此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乃見改變。

一九一九年一月，京都大學經濟系主任河上肇創辦了社會問題研究雜誌，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思潮，另有改造、解放等介紹了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新村主義，周恩來是以上刊物的讀者。此外，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等專書也進入其視野，但他此時尚非馬克思主義者，仍和大多數的有志青年一般，以愛國為第一要義，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與馬克思主義無涉。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因學業與生活等問題不得解決，乃取道東京返國，次月五四運動爆發，他投身在這股政治抗議的浪潮中，激起了部分的水花。

五四運動震動全國，天津以地近北京，各校代表迅於五月六日集會，次日組成天津學生臨時聯合會，十四日正式成立學聯，二十五日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問世，六月十八日，一百七十多個單位共組的天津各界聯合會宣告成立，展現學生運動擴大為國民運動的效果。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刊，報頭下用英文印著「民主：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們的座右銘」，此語出自林肯的蓋茨堡演說詞，顯示了彼輩青年欲「以美為師」。報紙兩旁且印有醒目的口號：「本革新和革新的精神為主旨，本民主主義發表一切主張。」這兩句話是主編周恩來擬的，重複出現在他署名的發刊旨趣中，不見馬克思主義的影子。

周恩來一如其他五四人物，認為對付北洋政府不能單用請願、上書、發宣言的辦法，更重要的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拒絕納稅等舉措，造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他還號召成立各種組織、工會和同業公會，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用全國的實力攻擊

^⑧ 註^⑧ 鄭學稼，「中共成立前後的毛澤東」，頁一〇〇七。

北洋政府。論及勞工問題，他主張工人與資本家協調分配利益，透過義務教育改善工人的生活，並用南開式的通才教育培養青年活力，掃除軍閥亂政、經濟落後、民衆無知等積弊。他在批判資本主義時，每以上海等地的日本和英國紡織廠為目標，可見民族意識高於階級意識；對於中國革新須經俄國十月革命那樣的大流血一事，則深表懷疑^⑩。總之，周恩來此時的思想非常駭異，在社會與工業的改良方面，傾向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又接近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和人道主義，其為溫和派的社會主義則一。

一九一九年八月間，山東軍閥馬良鎮壓群衆運動，槍殺三名回族人士，並逮捕遊行的學生三百餘人，天津代表乃赴北京請願，有人因此亦被逮捕。同月下旬，周恩來等人發動數千名學生，包圍兩地的警察廳，迫使北洋政府釋放了所有群衆。十月十日，他又參與遊行示威，稍後起草天津學生「短期停課宣言書」，促使社會覺悟，並示「救國不忘求學，求學不忘救國」的決心。文中強調國慶是一國的大典，全體國民理應慶祝，各界人士赤手空拳，「秉著愛中華民國的心，去慶祝國慶，我們還有什麼懼怕麼？」^⑪周恩來此時愛護中華民國，後來背叛中華民國，或有自圓其說的理由，但個性中具善變的一面則不容否認。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劉清揚、馬駿等二十人在天津學聯會議室聚首，決定成立覺悟社，後經社員集體討論，而由周恩來執筆寫成「覺悟的宣言」，發表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社刊覺悟上，這份短命的學生刊物，創刊號即為終刊號，影響力的大小可以想見。宣言透露了覺悟社的目標，是本著反省、實行、持久、奮鬥、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的精神，適應「人」的生活，做學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業。抽象的話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發揚宗旨的方法則有四種：(一)取共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人士的言論——著作和演講；(四)灌輸世界新思潮。宣言最後強調，他們全是學生，不敢說已經覺悟，但齊心努力向覺悟的道上走，也盼望社會上所有的人士同行，一步步的覺悟，一步步的進化；覺悟無邊無止，進化亦無窮無盡^⑫。

世人不難由此明瞭，周恩來當時尚非一名革命者。革命（revolution）有別於進化（evolution），前者為「再進化」，即以人力加速進行，可謂急進；後者則為緩進，而為周恩來所念念不忘。宣言裏的十種精神，也說明他當時傾向理想的改革，與馬克思主義無關，其中肯定互助的重要，更與馬克思主義相悖。中共後來只好承認，覺悟社員「畢竟還沒有找著真正能保證實現自己的理想的科學理論，仍舊不能徹底擺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影響」^⑬。後來成為周恩來妻子的鄧穎超，回憶起五四

註⑩ 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年三月，初版），頁二九。

註⑪ 周恩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學校學生短期停課宣言書」（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三日），收入懷恩選編，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一六九。

註⑫ 周恩來，「『覺悟』的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入同前引書，頁一八〇。

註⑬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頁三三四。

運動時也表示，覺悟社員中她的年紀最小，不常參加正規的討論，但常聽到比較年長的社員們談論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產主義，只聽說最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寧，以及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了，但那時還得不到這類問題的讀物^④。換言之，那時國人對列寧和十月革命不知其詳，深入研究的專書幾乎為零，少數原著如共產黨宣言的譯本又錯誤層出，因此確如鄧穎超所說，大家都不懂共產主義，只有滿腔愛國的熱情。

六、結論

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亦即原始的目的所在，殆為救亡圖存，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因此可謂防衛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古代「文化的民族主義」。同理，中國現代化在死裏求生的心情上推出，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廣義的五四運動，就是雙重防衛的運動——民族主義兼現代化。就後者而言，催生針是民主與科學，催生者是知識分子。

平情而論，中共得以走上現代史的舞台，初拜第三國際之賜，黨員則多為知識分子，後來又有其他知識分子加入，其所以如此，實因彼等遭逢清末以來中國文化的危機，傳統的地位與尊嚴宣告解體，以致缺乏附著物與安定力，成為浮游的「意識形態人」，於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真貌顯現後，開始懷疑西式的民主理論，轉而接受俄式的馬克思主義，以此為萬應靈丹^⑤。中共黨員多屬魯迅所說「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們在波濤洶湧中見到移植而來的共產主義橫木，即視為安身立命之所，更想像因此將出現廣廈千萬間。換言之，他們以為這塊橫木能夠造成兩大目標：國家的新生與個人的解放^⑥。殊不知這種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信仰，正是五四運動的主流，共產主義則適得其反。待彼等的利用價值已過，成為負擔與障礙時，有人便設法停止其思想，甚至結束其生命，以求根本解除心腹之患，大陸知識分子的悲劇，乃成歷史的必然。相形之下，陳獨秀等人走得較早，不必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煉獄，可謂不幸之幸了。

五四運動前，陳獨秀除以愛國和民主主義見長外，也以政治和文學的革命者名世。在他駁雜的思路中，進化論同時佔有重要的一席，強調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⑦，人身如此社會亦然。萬物的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中國衰亡的現象不止一端，而抵抗力的薄弱，為最深最大的病根。「老尚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以大盜；貞直之士，謂為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

註④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收入周恩來的一生資料選輯（香港：新中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七八年一月第五版），頁二六。

註⑤ 胡秋原，「關於一九三二年文藝自由論辯」，收入胡秋原文章類編之一，文學藝術論集下冊（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初版），頁九四二。

註⑥ 夏志清，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出版），頁三二。

註⑦ 陳獨秀，「敬告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收入獨秀文存上冊，頁一。

梁啟超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他的反傳統思想，或由此而萌；效美法之說，亦由此而起。「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幸福事功，莫由倅致。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⑦此種強者哲學，為中國有志之士的共同呼聲，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莫不如此，其所號召者不以無產階級為限，自不待言。

正因陳獨秀此時心中無馬克思主義，中共的史家有不能已於言者。中共奉恩格斯之說，認為「把歷史看做一系列的階級鬥爭，比起把歷史單單歸結為生存鬥爭的彼此之間極少差異的各個階段，就更有內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⑧由於陳獨秀用進化論看問題，未用階級觀看問題，他的思想運動就頗遭非議：「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自強』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提高人民覺悟和反封建專制鬥爭的辯證關係，因此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當時的政治鬥爭脫節。」^⑨此種論斷證實了馬克思主義未涉足中國的啓蒙運動，陳獨秀與新青年在五四運動前也未以俄為師。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一本愛國與民主主義的初衷，投身於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中。當真相大白，他眼見西方民主國家的不義，國際公理的不伸，悲憤之餘，逐漸不能盡信民主制度的本質與理想。此時第三國際處心積慮移植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來，他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地位，吸引了莫斯科的目光，遂舉為中共建黨初期的大家長，展開其驚濤駭浪的政治生活，以迄三十年代初期的完全敗陣。陳獨秀是感時憂國者所託非人的悲劇典型，這已是五四運動結束後的事了，世人或可為陳獨秀惋惜，卻不必對五四運動懷疑。

李大釗被視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初與其他啓蒙者一樣，宣傳人道主義，主張思想自由與學術民主，熱愛自信的言論，尤喜自由的言論，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腐學說的圈圈。當時他所憧憬的青春中國，是法蘭西式的共和國。中共現在指出，十月革命後，李大釗迅速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⑩。其實他仍然認為，思想領域的爭論只能透過說理來解決，不能依靠暴力強分勝負。「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⑪更重要的是，他雖然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但始終強調互助論，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倫理觀——要待完成了階級鬥爭後，人類真正理想王國才會來臨的理論，深表懷疑，認為應予修正^⑫。此外，他表示宣傳此等主

註⑦ 陳獨秀，「抵抗力」（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入同前引書，頁三四。

註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頁三七三。

註⑨ 彭明，前引文，頁一二八。

註⑩ 李義彬，「他高舉著火炬走來—李大釗烈士在五四運動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

註⑪ 李大釗，「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收入李大釗文集（下），頁九。

註⑫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93~94.

義出自個人的責任問題，相信也可以隨時修改^{⑤3}。這種口吻，實非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所以我們寧視其為人道主義的書生，而非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捍衛者。

五四運動前，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長任內冷落了毛澤東。一九一八年秋，毛澤東從湖南抵達北京，經北大教授楊昌濟的介紹，十月間來到圖書館工作，在閱覽室整理報紙，並登記入館者的姓名，職位稍高於清潔工^{⑤4}，只能算是校役，北大職員錄中也不見載，月薪不過八元，恰為館長的十五分之一，實在難以餬口，他深感前途無望，因此短短四個月就求去返鄉。中共後謂李大釗賞識並提攜了毛澤東，與事實頗有距離。此外，他在介紹俄國革命時又突出了托洛斯基，恐亦不符後來的政治尺度。

五四運動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固有所宣揚，也有所批評。國民黨容共後，他擁護了青天白日旗：「民衆要團結起來，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打破帝國主義及反革命的黑暗勢力！黑暗的勢力，遮不住青天白日的光輝。」^{⑤5}凡此種種，有其時代的背景，自可因他的早走而不予深究，甚至一筆勾銷，以壯中共黨史的聲勢。

五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衆的大聯合」，該文後被中共譽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可貴的收穫，也是後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⑤6}，抬舉甚高。然而該文確在稱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表現出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延續肯定。中共現在無法抹煞，只好同時承認：「毛澤東同志當時究竟是處在由急進的革命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還沒有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沒有徹底轉變世界觀。這主要表現在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和無產階級專政論，還缺乏應有的認識。」^{⑤7}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正是階級鬥爭論，後者與暴力革命論實不可分，中共今以含有肯定互助論的文字，做為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一，無異再度說明青年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混雜，以及他不是一個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生平第一次撰寫介紹馬克思的文字，即為這篇「民衆的大聯合」，已如前述是在明揭馬克思主義不如無政府主義。中共今天不得不表示，該文對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看法，也「缺乏全面的正確的認識」。毛澤東認為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鷺旗易了紅旗，原因是沙皇軍隊本由平民的兒子、哥哥和丈夫所組成，當他們把機槍對著平民時，後者便大聲呼喚，「這一片喚聲，早使他們的槍彈，化成軟泥，不覺得攜手同歸，反一齊化成了抵抗貴族和資本家的健將。」這種觀點，正是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主張的忠告運動與呼聲革命，他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亦然：「我們已經得了實驗，陸榮廷的子彈，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來發抖，就要捨命的飛跑。我們要知道別國的同胞們，是通常用這種方法，

^{註53} 洪長泰，「李大釗和他在五四前後所走的路」，收入洪著，現代史料信錄附錄（香港：東風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一月出版），頁一一八。

^{註54} Stephanie Kirkes: "Mao as Library User and Worker," *American Libraries*, Nov. 1976, p. 630.

^{註55} 李大釗，「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收入李大釗文集（下），頁八三九。

^{註56} 張勝祖、宋斐夫，「毛澤東同志青年時期思想發展初探」，收入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版），頁一六。

^{註57} 同前引文，頁一七。

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這樣強調以和平的手段代替動武，當然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中共現在只好說：「他暫時還不懂得暴力手段對一場真正的社會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道理。」[◎]

一九二〇年六月，鎮壓反日愛國運動的張敬堯被譚延闔推倒，象徵湖南境內五四政治活動的告一段落。毛澤東乃於七月上旬經上海返湘，靠易培基之助，擔任第一師範附小的主事。此時新民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綱領，旨在真正的自治，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政府，贊成一種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綱，他們在自己辦的新湖南報上公開鼓吹這種改革[◎]。此為毛澤東所自述，至少說明其時他仍未放棄民主主義。由上可知，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政治參與，主要扮演了一種響應者的角色，其聲音與力量多集中在湖南一省，影響力就全中國而言自屬有限，內容也多與馬克思主義無關。

周恩來生於十九世紀末葉，長於二十世紀初期，其時中國積弱已久，外侮頻仍，有志青年無不感時憂國，他也不例外，十五歲小學畢業時，與同學的臨別贈言為「願相會中華騰飛世界時」，此種心情放諸國內而皆準，甚至郁達夫筆下的留學生，沉淪之際仍不忘呼求祖國的強大，則其普遍性可以想見。本著挽救祖國的純潔動機，周恩來參加了五四運動，扮演了一個地區性的角色。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周恩來把馬克思主義摻雜在這項愛國運動裏。雖然他棲身日本時接觸過社會主義的書刊，後來坐牢時也向難友們介紹過馬克思學說，但是許多勤於吸收新知的中國有志之士，如梁啟超、朱執信以至戴季陶等，都有類似的閱讀經驗和轉介之舉，不能遽言他們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自幼至五四時期，主要是一名愛國主義兼民主主義者，其理念完全反映了五四運動的內容——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北京學界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天，發表由羅家倫執筆的遊行宣言，明白揭橥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二語，分別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具現，也已為周恩來所拳拳服膺，身體力行。

周恩來旅居法國後，受到歐洲左傾潮流的影響，加上張申府、蔡和森等人的鼓勵，逐漸放棄民族主義，轉為信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他後來坦承自己認識共產主義甚晚，而且是「先入黨，後信仰」[◎]，益證五四時期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無涉。周恩來一如毛澤東，告別五四後造成思想的空間，遂為馬克思主義所填佔，此亦為不容否認的史實，但中共現謂以民族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五四運動，使得周恩來走上了反對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道路，這樣粗疏的邏輯，能否達到既肯定五四運動，又抹紅五四運動的效果呢？

*

*

*

註[◎] 毛澤東，「民衆的大聯合（一）」，頁一〇。

註[◎] 張勝祖，宋斐夫，前引文，頁一七。

註[◎] 愛德迦·史諾筆錄、方穀譯，前引書，頁二九。

註[◎] 周恩來，「西歐的『赤』況」，原載覺郵第二期，收入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引自陳三井，周恩來旅歐時期的政治活動（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出版），頁二八八。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xperiences of Prominent Communists

Yu-sun Chou

Abstract

W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ok pl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d not yet come into existence. However, s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movement later joined the CCP.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m were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also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movement.

On the ev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en Duxiu strongly advocated democracy, science, and a new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reform—new arts. These were the main content of *Xin Qingshian* (New Youth)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t that time, his writings showed almost no trace of Marxism.

Li Dazhao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propagator of Marxism in China. However, although accepting, with some reservations, Marx's economic theories, Li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mutual assistance and doubted Marx's assertion that utopia could emerge only through class struggle. He thought that this socialist ethics needed to be revised.

Mao Zedong played the role of a supporter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his activi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Hunan Province, he had limited influence on China as a whole. What he advanced had little to do with Marxism and much more for anarchism.

Zhou Enlai played a regional rol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pure patriotism. At that time, his thoughts fully reflected the content of the movement—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here was no evidence to show that he tried to link Marxism with this patriotic movement.

Some participant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a broad sense, had some knowledge of Marxism. However, in that period when many different theories coexisted, people often supported several political beliefs at the same time. Some people who accepted Marx'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still rejected Marxism's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class

struggle. Thus, these peopl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and it is inappropriate to say that anti-nationalist proletarian ideology took the lead in the patriotic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s :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Chen Duxiu, Li Dazhao, Mao Zedong, Zhou Enlai, May Fourth Movement.

